

调查研究

强化创新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引领

张铭慎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也是加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需要看到，创新是影响国内国际循环演进的关键力量，应着眼更好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和提升国内国际循环的关系和层次，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创新是关键力量

国内国际循环的演进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始终是优化和提升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和层次的关键力量。

从国内循环的演进看，创新能有效推动循环层次和范围的优化，为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都曾出现过因创新水平发生变化而影响国内循环发生变化的情况。创新能力较低会导致生产要素单一、分工水平有限、供给质量不高，再加上存在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情况，一国的国内循环就会呈现出层次不高、范围有限等低水平特征。而随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创新体系的日益成熟，技术、管理、知识等要素开始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供给质量提升，进而带动供需匹配螺旋式上升，有力推动消费升级，使国内循环在层次和范围上都有明显提升。对我国而言，创新在培育产业体系 and 内需体系等方面，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国际循环的演进看，创新牵引了国际循环参与方式的变化，是一国提升其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通过原料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和标准输出等多种方式参与全球化。其中，原料输出

基本由一国的自然禀赋决定，相比之下，商品输出则相对高级，但仍取决于一国所处的价值链环节。资本输出多蕴含着扩大市场、降本增效、垄断技术等目的，技术输出和标准输出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掌握着产业链、创新链的治理权。目前，国际循环仍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输出廉价原材料和商品，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和标准。若一国谋求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优势的攀升，必然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关键因素。

从国内国际循环的关系变化看，创新能有效促进一国对循环控制力的提升。一国的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在客观上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创新诱发的动力机制、竞争优势、经济结构的转换主导了国内国际循环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影响着国内国际循环的技术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

创新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通过创新畅通优化国内国际循环的能力大幅增强。

一是创新衍生出的新供给新需求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有力支撑了国内经济循环。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复杂国际形势的叠加冲击，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仍在不断壮大，从供需双侧对国内经济循环形成了有力支撑。从供给侧看，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较2019年增长35.3%。2021年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1%，两年平均增长12.8%，经济新动能增强态势得到延续。从需求侧看，创新衍生出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2021年前三季度，内需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5%，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7%，快于全部投资11.4个百分点。

二是依托创新改善外贸外资结构、强化国际合作，优化了国际经济循环。从外贸结构上看，我国高端制造业零部件设备占进口的比重，以及机电产品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持续提升。据测算，我国中技术到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07年达峰至0.45后，逐步下降至2020年的0.31，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70.8%上升至83.3%，显示出比较优势指数长期处于1.2至1.4的水平，还在一些年份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位势逐步提升。

三是以创新助力补短板 and 锻长板，推动了国内国际循环关系的调整。近年来，我们将实现多元化供应作为提升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途径，着力在信息安全、操作系统、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实现创新突破，同时考虑推动部分外向内需转化。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而且能有力推动国内市场供给质量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国际知名创新型企业在我国设立生产工厂或研发中心，表明较为灵活的创新制度和强大的内需市场使我国已经成为部分成果商业化的首选地、必选地、最佳地。

重点是加强体制机制保障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需增强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一方面，需进一步健全以创新提升

国内循环的体制机制，实现创新链条自身循环的畅通，也为产业等层面的循环赋能，促进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要不断完善有利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形成持续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强化国家战略和应用需求牵引；不断完善促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强化市场化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改革中的作用；不断完善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耦合的体制机制，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大小企业深度融通，推动企业成为创新的需求出题人、牵头实施人与主要受益人；不断完善畅通创新链循环的配套机制，围绕中试熟化、价值实现、反哺科研等关键环节，形成有利于中试基地建设运营、国有资本便利退出、转化收益创新运用的体制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以创新优化国际循环的体制机制。以国际创新合作与治理协调为重点，提高开放创新的总体效能。建议进一步健全基于国际合作的开放创新的体制机制，主动设计和牵头发起跨国科技创新合作，探索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参与针对前沿科技和全球问题的科技治理磋商，健全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和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共享和监管协调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优化促进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体制机制，继续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稳妥推进国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与多边规则有机衔接。

此外，还需强化创新在增强国内循环稳定性和韧性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打造全球最佳创新转化应用地，进一步激发创新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更好发展数字经济，既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

推动数字经济

数字发展 催生新业态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

从深化实践的角度看，重点是加强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治理既是对数字化的治理，也体现为治理的数字化。

对数字化的治理，是以数字化转型为大背景，从治理层面进行体系变革，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数字化转型的实效和价值的最大化；治理的数字化，是通过平台、工具等技术手段对组织以及组织内资源、数据、技术、流程等实施数字化管控，保障治理效能、提高治理效率。

数字化治理主要依托企业和政府两个主体。企业的数字化治理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防范风险，而且可以构建企业新的数字化能力。企业实现数字化治理，需要创新融合的技术手段、管理方面的全流程监控，以数字化工具储存和保护重要数据及记录、平衡企业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等。政府的数字化治理主要表现为精准施策，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技术供给，在有力破除信息孤岛的

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安全。

从发展路径的角度看，重点是开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开展国际合作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内在逻辑。

一方面，世界各国都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国也需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中蕴藏着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推动者和建设者，一直以来致力于

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为提升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贡献“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需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经济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通过有力有效的国际合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王伟玲：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着力点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的要求，在“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在此背景下，我们需加快推动创新，围绕各类主体的应用需求，建设好数据要素市场，强化数据流通规则完善和标准建设，统筹效率与安全。

一是努力打造富集多元的数据供给体系。充分的数据供给是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基本前提。从数据分布看，我国数据体量巨大、种类多样，具备较大的数据供给潜力，但数据资源碎片化现象突出，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融合机制有待完善；从物理载体看，我国大数据中心建设存在结构性失衡，需进一步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体系；从数据采集看，目前我国数据采集的标准、通信协议、数据格式都不统一，使数据流通互认困难。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据共享机制，增强算力的匹配和调度，完善数据相关标准，支持发展数据标注等新业态，为数据要素市场更好

方面的人群，重点关注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等群体，探索自由职业者享受政府和社会提供的保障的办法；统筹推进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筹资机制、待遇保障、经办管理等方面的全面统筹；缩小区域间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努力建立均等化、可持续、流动性强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各类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之间的互补和协调。

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既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上持续发力，又要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还要防止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坚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

黄朝椿 汪寿阳 乔 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把“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强调“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这些重要理念、创新观点、鲜明论断，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是人们全部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劳动创造人们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有效劳动的多少并实行了怎样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设想未来社会时指出，“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特别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的论断，体现了生产力标准，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语义上讲，“勤劳”包含“劳动”，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劳动。从经济学角度看，“勤劳”能够以其积极的、特别的方式正向地影响生产活动。一方面，相对于一般性劳动，“勤劳”将会因为人们工作时的用心敬业、精细科学、刻苦钻研、责任担当等渗透进生产过程，在经济活动中产生溢出效应，这就能在相同时间、相同投入、相同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现代化大生产具有大规模、连续性、系统化等特点，这些特点天然地需要与以“勤劳”为特质的劳动结合在一起，进而避免出现交易成本、生产成本的增加。可以说，“勤劳”实际上推动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右移，整体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第二，“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归根结底是要靠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归根结底是要靠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来创造。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人民是“主角”，人民既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又是共同富裕的共享者。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

我们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关键是要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重点在为人民群众勤劳创新致富创造条件、提供环境。既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又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第三，“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重要论述，指明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促进共同富裕，根本上靠内因，就是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制定政策的逻辑起点，同时廓清了一些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模糊认识和思想迷雾。

一是在实现程度上，不搞“平均富裕”。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共同”不是“平均”，促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改善。我们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尊重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到什么时候都可能存在收入上的差距。

二是在实现时间上，不搞“同步富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都将在一定意义上长期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

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危 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征程上，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这一过程中，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一个重要抓手。

应该看到，中等收入群体具备稳定的购买力，这一群体的庞大消费能促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发挥，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这一群体的稳步扩大，还能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

亿人，总量不少，但以14亿多人口的基数计算，所占比重约为30%，还有较大增长空间。新的征程上，我们需更加重视精准施策，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有效识别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群体。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等群体，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群体。具体来看，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技术工人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对于这些重点群体，需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找准当前影响群体收入提升的关键因素，通过差异化政策措施精准推动其有效增加收入。对高校毕业生，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实现

学有专长、学有所用；对技术工人，要在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上下功夫；对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要采取务实有效措施帮助他们稳定经营、持续增收；对进城农民工，要促进他们安心进城、稳定就业。整体上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使更多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另一方面，要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进一步研究推动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办法。

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健全完善社会保障。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给予人们稳定的预期，有效巩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下一阶段，需在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上切实发力。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